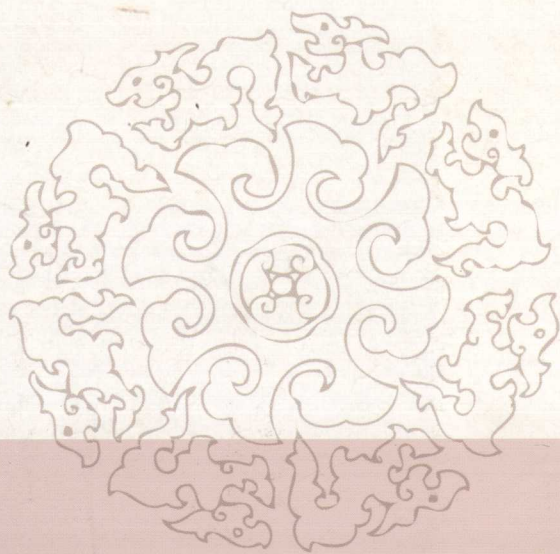


【十三经开讲】

公羊传开讲

张善文 马重奇◎主编
翁银陶◎著



重读经典
弘扬国学

中华五千年经典文化的魅力
——哲学之精妙，文学之灿烂，
史学之辉煌，在这十三本书中作
出了简明生动的展示。

013055113

K225. 04
22

开讲
一

公羊传开讲

张善文

马重奇◎主编
翁银陶◎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航

C1662984

K225.04
2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羊传开讲/翁银陶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8

(十三经开讲)

ISBN 978-7-5617-8900-1

I. ①公… II. ①翁… III. ①公羊传—研究
IV. ①K225. 0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3855 号

十三经开讲

公羊传开讲

主 编 张善文 马重奇

著 者 翁银陶

策划编辑 朱杰人

项目编辑 曹利群 陈庆生

审读编辑 汪 滢

责任校对 王 卫

装帧设计 崔 楚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常熟高专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8.25

字 数 214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8900-1/G·5282

定 价 24.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北航

C1662984

上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十三经开讲》修订版弁言

张善文

费时半载,《十三经开讲》终于修订告成,有以呈献于读者了。

这是一套以浅显简易的语言述谈十三经的小型丛书,旨在与当今的青年读者共同研讨这十三部极具历史文化意义的中国古代经典。全书沿承“开筵讲习”的传统教学理念,力求遣词平白,用语轻松,于素淡通俗的氛围中展示经典深永奥雅的学术精神,故题曰“开讲”。

此书十五年前曾以《十三经漫谈》为题,由台北顶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在台湾学界产生过较为良好的学术影响。今复作全面修订,提交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改版刊行。本次修订,除了更名为“开讲”,将繁体字改为简体之外,另有如下几方面侧重把握:即细校引文、详审观点、润色辞采、充实资料、增补内容,总以严谨缜密为本,期盼推出一套精益求精、富有启迪意义的十三经入门读物,以裨益于学术教育界,繁荣并发展今日国学研究之芬馨文苑。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序有云:“经稟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这几句评述尽管带有往昔学人的尊经心愫,但还是颇为客观地说出了“经”的至为崇高的历史地位,值得我们平情思量。毋庸置疑,中国古代经典的浑厚悠远的学术价值,仍期待着众多华夏学人的不断研探与发掘,其永恒的思想晖光必将更加灿亮地映照于人类学术文化之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董事长朱杰人教授对此书的出版给予深切关注，本书项目负责人曹利群编审、项目编辑陈庆生女史为此书的编排审读工作均付出诸多心血，在此谨致谢忱。书中恐仍存不少未妥、未切之处，至盼读者批评指正。

二零一三年三月

写于福建师范大学易学研究所

总 序

张善文

十三经者，我国五千年悠久辉煌的民族文化宝库中最为精粹的十三部经典著作之总称。

先师黄氏六庵教授（讳寿祺），昔有《群经要略》之作，其书《自序》尝综述诸经之特色云：“余以《尚书》为吾国最古之史，亦吾国各体散文之祖；《诗经》为韵文之渊薮；《春秋》为记事之宝书，此三经于文史关系最钜。”又曰：“近世《礼》学废绝，专业者至稀，而讲《孝经》者亦每失其义。《论语》、《孟子》支配吾国人思想者垂二千年，昔则家弦户诵，今至大学文史系学生竟罕能举其篇目。《尔雅》关乎文字训诂，不识字何以读书作文？”又曰：“独《易》道广大精微，见仁见智，无体无方，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不为典要，惟变所适，初学难以极深研几。”这几句话十分精辟地点明了群经在我国文化史上的显著地位、内容特色，并指出近世学者对经学研究的荒疏与缺陷，其言辞之间，不无激励后人当珍视国学而努力研治之良苦用心存焉。

一九九三年夏末，我与罗莹兄赴台湾访学，幸识台北顶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总编辑陈清荣先生，与之论及中国经学后继乏人的现状，并提议倘能编撰一套简说十三经要义的普及丛书，必将引发今日青年一代治经的兴趣，且将有益于振兴中华民族文化之千秋大业。陈先生闻毕此论，至为赞许，嘱我及早安排编撰事宜。是为《十三经漫谈》之最初编撰缘起。

越二载，一九九五年初夏，我以出席台湾大学与台湾易经学会联合主办的“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之机再度赴台，又趁暇与陈清

荣先生深入商讨《十三经漫谈》的编写步骤，承其全力支持，遂落实了此套丛书的编辑与出版规划。是年回福州后，我即邀马兄重奇教授共同担任主编，并请罗萤、郭丹、徐启庭、翁银陶、徐六符、汤化、陈节、林志强、黄黎星、刘松来、谢金良、杨志贤、巫少鹏、叶全君等诸位同仁分经撰写，历时一载有奇，经过多次研讨商榷，今喜各书已相继完稿待梓，而诸位撰稿人所付出的努力亦将转化为有补于社会教育之学术成果矣。

中国古代之言“经”者，乃典型常久之谓，故“经典”二字常被联用，而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篇》遂称：“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先秦时代，我国有六经之书，即孔子授徒所用的《周易》、《尚书》、《诗经》、《礼经》、《乐经》、《春秋》六部典籍。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乐经》亡佚，故西汉复兴经学，仅立五经博士。稍后又曾将《论语》、《孝经》增列为学官讲经之典籍。及至唐代，学官所立，于《礼》中分《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于《春秋》中分《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乃成九经；嗣又增入《论语》、《孝经》、《尔雅》，皆刻石于国子学，于是有十二经之名。有宋一代，程颐、朱熹诸儒出，更取《礼记》中的《大学》、《中庸》配《论语》、《孟子》而合为一帙，谓之《四书》，则《孟子》亦入“经”矣，此后风行天下之十三经遂以《孟子》殿焉。明清以降，尤其是清代学者阮元编校《十三经注疏》之后，这十三部经典更进一步受到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普遍重视，乃至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学术最集中、最深邃、最典型的象征。

略考十三经之编次，依前儒成例，分别为：《周易》第一，《尚书》第二，《诗经》第三，《周礼》第四，《仪礼》第五，《礼记》第六，《春秋左传》第七，《春秋公羊传》第八，《春秋穀梁传》第九，《论语》第十，《孝经》第十一，《尔雅》第十二，《孟子》第十三。本丛书的编

纂，即以此为序。各书的撰写，力求简明通俗，浅显生动，言之有物，以合“漫谈”之宗旨。然因诸经原有深浅难易的区别，加以撰稿者分析角度的差异、行文风格的不同、学术水准的未臻一致，或许仍存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凡此，则至盼读者及学术界各领域之大雅君子之不吝赐正。至于整套丛书面对今天的青年读者，以向他们普及中国经学常识的撰述原则，我想各书的作者一定是兢兢业业地认真把握的。

欲治中国学术者，必自群经始。但研治经学绝不可盲目，务必明确入门的途径，掌握正确的治学方向，才能自立于学术界而有所建树。此即宋儒程颐所谓“见得路径”，“立得一个门庭”之意。先师六庵教授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在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研究室演讲《论易学之门庭》时，曾强调指出：

读经须先立得门庭。所谓门庭者，便是从师讲问如何下工夫，如何读书。再伸畅其说，便是凡治某一种学问，必须求师指导一了当之途径，使不至迷罔眩惑。若不知要领，劳而无功也。（见《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一辑，黄寿祺、张善文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

先师之学源于章氏太炎先生，为章门再传高弟，曾受业于礼学家吴检斋（承仕）先生、易学大师尚节之（秉和）先生等学界宿儒，其所论析研经之道，允为前辈学者治学的至理名言。今值本丛书完稿之际，谨以先师的教诲奉献给有机会读到本书的朋友们，庶可与他们共勉，也期望本书对年轻读者研读十三经有较多的帮助，更期望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跨世纪的新一代学者的努力下，焕发出更加瑰丽的学术之光！

公元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岁在夏正丙子大暑后七日

前 言

在儒家十三经中,《公羊传》的知名度远不如《周易》、《诗经》、《左传》、《论语》、《孟子》等。可是在汉代,《公羊传》乃是当时备受帝王、贵族、士民青睐的经书,研究《公羊传》的“公羊学”,乃是当时最为昌盛的经学流派之一;在清代后期,《公羊传》的思想也曾被当时众多的儒者以及放眼世界的先进人物所推崇,并成为清末戊戌变法的理论指导;就是在魏晋至明代的公羊学衰落时期,也仍然有人在注释、研究《公羊传》。这说明,《公羊传》自有其不容忽视的思想价值,自有其可资历代执政者、乃至一般知识分子借鉴的丰富的内容。《公羊传》的思想价值表现在哪些方面?它为世人提供了哪些借鉴?汉代人为何青睐于《公羊传》?公羊学的历史进化论是如何指导戊戌变法的?魏晋至明代的公羊学又是如何在低谷中徘徊前进的?凡此种种问题,都是笔者在这本书中所要介绍、论述的。笔者希望通过这些介绍、论述,使读者对《公羊传》的内容、思想、以及历代公羊学有一较全面、较深入的了解,并进而对公羊学研究产生初步的兴趣。笔者相信,这对正确认识儒家学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不无益处的。

翁银陶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目 录

《十三经开讲》修订版弁言	张善文
总序	张善文
前言	1
第一章 《公羊传》的成书、传授及其与《左传》之争	1
第一节 《公羊传》的性质及作者	1
第二节 《公羊传》在汉代的传授	6
第三节 鲁学与齐学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	10
第四节 《公羊传》与《左传》之争	13
第二章 《公羊传》的形式与内容	15
第一节 《公羊传》的形式	15
第二节 《公羊传》的内容	17
第三章 《公羊传》与《春秋》及春秋史的关系	26
第一节 关于《春秋》	26
第二节 《公羊传》思想与《春秋》思想的关系	32
第三节 《公羊传》与春秋史的关系	37
第四章 《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	41
第五章 《公羊传》的仁政思想	51
第六章 《公羊传》的反侵略思想	61

第七章	《公羊传》的“君君臣臣”思想	69
第八章	《公羊传》论人伦关系	79
第九章	《公羊传》的据鲁亲夏思想	95
第十章	《公羊传》论君臣修养	114
第十一章	《公羊传》的改革思想	125
第十二章	董仲舒的公羊学思想	134
第一节	大一统思想	136
第二节	天人感应理论	140
第三节	阴阳五行化的人伦思想	147
第十三章	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	153
第一节	《春秋公羊解诂》的内容	154
第二节	三世说	158
第三节	讖纬迷信思想	163
第十四章	魏晋至明代的春秋公羊学	170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的春秋公羊学	171
第二节	唐代的春秋公羊学	176
第三节	宋代的春秋公羊学	184
第四节	元明的春秋公羊学	198
第十五章	清代的公羊学研究	206
第一节	清代的公羊学思想	206
第二节	康有为的公羊学思想	234
后记		246
修订版后记		247

第一章 《公羊传》的成书、传授及其与《左传》之争

第一节 《公羊传》的性质及作者

《公羊传》是儒家十三经之一，是一部以挖掘《春秋》的微言大义^①、阐释《春秋》的思想内涵为主的经学著作。《春秋》是春秋时代鲁国的史书，它以编年体的形式，极其简略地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七二二年至四八一年），共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周王朝及诸侯国的大事。由于《春秋》过于简略，一般只记事件的结果而略去其具体过程（详本书第三章），同时，更由于后代儒家学者多认定《春秋》乃孔子所作，书中寓含有孔子博大精深的思想，故尔在《春秋》问世后，便出现了不少注释、解说《春秋》的书，《公羊传》便是其中之一。

据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类似《公羊传》的著作原先共有五部，即：

《左氏传》三十卷

《公羊传》十一卷

《穀梁传》十一卷

《邹氏传》十一卷

《夹氏传》十一卷

但这五部中，后两部在东汉时就已失传。据班固说，《邹氏传》是因无

① 微言大义：指蕴含于《春秋》遣词用语之中的精深思想与哲理。

传授之师而失传的，《夹氏传》则“未有书”，也就是说，在班固写《汉书》时，它就只留存下书目而未见其书，所以今天人们所能见到的先秦学者衍述、解说《春秋》的书，只有《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三部，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春秋》三传。

《春秋》三传虽然都是解说《春秋》的儒家著作，但由于作者不同、看问题的视角不同，因而三传在解说《春秋》时，其侧重点自然也就各不相同。具体说，《左传》以叙述历史史实为主，《公羊传》、《穀梁传》以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为主。如《春秋·庄公十年》云：“夏六月，齐师、宋师次于郎，公败宋师于乘丘。”

《左传》的解说是：

夏六月，齐师、宋师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师不整，可败也，宋败，齐必还，请击之。”公弗许。自雩门窃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公从之，大败宋师于乘丘，齐师乃还。

《左传》说这年夏六月，齐、宋二国军队进驻鲁国的郎地，鲁国公子偃劝鲁庄公于宋军军容不整之时出兵进击，庄公不听，公子偃遂私自带兵出击，庄公知道后，也领兵跟着进攻，终于在乘丘打败宋军，齐军见宋师已败，只好也撤回齐国。全文都是对《春秋》中“公败宋师于乘丘”的具体经过的叙述，没有一句涉及《春秋》经文的思想义理。

《公羊传》的解说是：

其言次于郎何？伐也。伐则其言次何？齐与伐而不与战，故言伐也。我能败之^①，故言次也。

《公羊传》以自问自答的形式，分析经文（以下凡单说经文的，均指《春秋》经文）之所以说“次于郎”，是因为齐、宋二国都来讨伐我鲁国；之所以说“次”而不说“伐”，是因为我鲁国能最终打败宋师；又

①《春秋》是以鲁为本位的史书，故《春秋》及其三传的“我”均指鲁国。

分析说如果齐国只参与宋国的讨伐而不参与宋国与鲁国的交战，那就应当称“伐”而不称“次”。全文全是分析经文“次”的深刻含义，没有一句讲到鲁与宋、齐的交战经过。

《穀梁传》的解说是：

次，止也，畏我也。不日，疑战也。疑战而曰败，胜内也。

《穀梁传》的解说同样也是挖掘《春秋》经文的“微言大义”：经文称“次”，表明齐、宋畏惧我鲁国；经文不写交战的具体日期，是因为这是一次使用诈谋的战斗；经文称“败”，是因为我鲁国胜利了。与《公羊传》一样，全文也没有一句涉及当时的历史史实。

在《春秋》三传中，由于《左传》以叙史实为主，故尔严格地说，它只能算是史学而非经学，只有《公羊》、《穀梁》二传才是名副其实的儒家经学。另外，三传于各自的侧重点之外，偶尔也会涉及到其他一些问题，如《左传》有时也会挖一挖《春秋》的微言大义，《公羊》、《穀梁》二传有时也会交待一下当时的史实。关于三传的这些差异及各自的特点、优劣，宋代朱熹曾有过简短而精炼的概括，他说：“《左氏》是史学，《公》、《穀》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①朱熹既显扬各传的长处，同时也毫不隐讳地指出它们的短处，堪称是公正的法官。

据东汉初年戴宏的《春秋说序》^②说：《公羊传》的思想内容最初形成于春秋末年的孔子弟子子夏，后子夏将其口授与公羊高，高又口授与其子平，平又口授与其子地，地又口授与其子敢，敢又口授与其子寿，汉景帝初年，公羊寿与其弟子胡毋子都一道，将这些世代口耳相传的对《春秋》的注释、解说写成文字，这就是《公羊传》从最初

① 《朱子语类》，见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17册，第2841页。

② 戴序见徐彦《春秋公羊注疏·序》。

孕育到最后写定的全过程，其间共经历了春秋、战国、秦汉等漫长的历史年代。

《汉书·艺文志》说《公羊传》的撰者为公羊子，唐代颜师古说公羊子即公羊高，后人多从此说，将《公羊传》的著作权归之于公羊高一人。然而根据戴宏序所说，公羊高不过是《公羊传》的传授者之一，他既不是最初的形成者，也不是最后的写定者，署上他一人的名字，岂不抹杀他人的功劳？实际上，《公羊传》是一部集体创作的论著，据戴宏序，这个创作集体包括子夏及公羊家族五人，共六人。这个数字准确吗？未必。我们只要稍稍考察一下历史就会发现，戴宏说的并不全面，传授《公羊传》的决不止子夏、公羊高等六人。子夏生于公元前508年，下距公羊寿所生活的汉景帝初年，约三百四十多年。可是据戴宏说，在这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公羊家族只传了五代，平均每两代之间的时间距长达六十多年。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照这样的时间距计算，公羊高是在六十多岁的晚年才生下公羊平的，公羊平出生后，公羊高至少还必须再活十几、二十年，以便到公羊平十几二十岁时，将《公羊传》的思想口授与他。同样，公羊平也必须在六十多岁时生下公羊地，也必须活到七八十岁，此后公羊家族的每一位都必须都是长寿的，都必须在六十岁左右生下一子。否则，这根接力棒就传不到公羊寿手中，这可能吗？显然不可能。春秋战国时人的平均寿命不过四十多岁。公羊家族哪能个个长寿、个个都于垂暮之年喜得贵子？再说，这个垂暮之年生下的儿子聪明吗？假如他是个天生的蠢才，一读书就打瞌睡，那该怎么办？要是生下的是个女孩，那又该怎么办？可见，《公羊传》的传授者除公羊家族的五人之外，必定还有其他人。只有其他人的参与，这根接力棒才能顺利地传到公羊寿手中。那么，这其他人是谁呢？答案就在《公羊传》中。

《公羊传》曾出现过七位阐发《春秋》微言大义的学者的名字，即：子公羊子（姓氏前加“子”，表示特别尊敬）、子沈子、子司马子、

子女（音汝）子、子北宫子、鲁子、高子，而且书中还录下了他们的话语，如《春秋·隐公十一年》云：“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公羊传》云：

何以不书葬？隐之也。何隐尔？弑也。弑则何以不书葬？《春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不复仇，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为不系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隐何以无正月？隐将让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

文中子沈子的话无疑是《公羊传》思想的组成部分之一，因而子沈子也就理所当然是《公羊传》的作者、传授者之一，是众多的公羊先师中的一位。又如，庄公三十年的《春秋》云：“齐人伐山戎。”《公羊传》云：

此齐侯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子司马子曰：“盖以操之为已蹇矣。”此盖战也，何以不言战？《春秋》敌者言战，桓公之与戎狄，驱之尔。

文中的子司马子显然也是公羊先师之一，也是《公羊传》的作者、传授者之一。据统计，《公羊传》中出现子公羊子的有两处，子沈子的有三处，子司马子、子女子、子北宫子、高子的各有一处，鲁子出现六处，总共十五处，这十五处仅是根据标出的姓氏而统计出来的，还不包括那些引了他们的话语而未标出他们姓氏的例子，如定公元年的“正棺于两楹之间，然后即位”这两句，据《穀梁传》说，是子沈子话语，可是《公羊传》却未标明。从上可见，全书至少有十六处的解说是出自子沈子等七人之口的，这七人中除了公羊子，其余六人显然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公羊家族外的其他的创造者、传授者。在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公羊传》就是靠着子夏、公羊高及子沈子等十几位公羊

先师的不懈探索、口耳相传，才得以写成文字、流传至今的。

第二节 《公羊传》在汉代的传授

《公羊传》写定于汉景帝初年，它一诞生，就受到汉代帝王的宠爱，得到汉代士大夫及学者、儒生的青睐。

汉代帝王曾就《诗经》、《尚书》、《仪礼》、《易经》、《春秋》这五部儒家经书分别设立博士，称“五经博士”，博士的职责是传授经书，如《诗经》博士传授《诗经》，《尚书》博士传授《尚书》。五经博士的设立有一个历史过程，最先设立博士的是《诗经》和《尚书》，时为汉初文帝年间，这时解说《春秋》的《公羊传》尚未写定，自然无法设立博士。可是到景帝初年，公羊寿一把《公羊传》写定，景帝就立即立公羊寿的学生胡毋子都和董仲舒为博士，而这时其他经书，如《仪礼》、《易经》，以及《春秋》三传之一的《左传》，虽然早已在士大夫中流传，但仍未设立博士，《仪礼》、《易经》到汉武帝时才设立博士，《左传》则更迟，直到西汉末年平帝年间，才因刘歆的一再建议而设立博士，比《公羊传》的博士设立晚了一百五十多年。《穀梁传》的写定时间可能略迟于《公羊传》，但不会迟于武帝初年，可是《穀梁传》的博士却拖到宣帝年间才设立，也比《公羊传》晚了七十多年。显然，汉代帝王对《公羊传》是另眼相看、特加恩宠的。

汉代帝王对《公羊传》的宠爱还可以从以下几件事体现出来。

事之一：胡毋子都的学生公孙弘本为布衣百姓，但由于学习《公羊传》有成就而被征为博士，后又擢升为丞相，封平津侯，可谓沾尽了《公羊传》的光。

事之二：董仲舒是汉代研究《公羊传》的第一位大专家，当时朝廷每逢有什么疑难问题、疑难案件，都要派使者或廷尉张汤去请教他，